

两个第一的“光环”

——纪念我的博士生导师梁钊韬诞辰 100 周年

格勒(藏学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梁钊韬先生与格勒博士在汶川

梁钊韬教授是我 1983 年-1986 年的博士生导师。今年 2016 年是梁钊韬教授诞辰 100 周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周大鸣教授特意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因本人大病初愈,无法重新写一篇,特将我过去的发言稿略作修改以纪念我最尊敬的导师。

今天我们又一次迎来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和学位授予仪式,我衷心感谢中山大学邀请我参加如此隆重的母校毕业典礼。因为我也是 28 年前从中山大学毕业的老学生,我很珍惜“中山大学毕业”这几个字的荣誉。没有 28 年前我在中山大学三年多的学习生活和严格的科学训练,也不可能有我今天的一切荣誉和自豪。尤其是今天,无论我走到哪里,头上总是顶着一个耀眼的光环,这就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和藏族博士。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我们周围聚集的许许多多好朋友,他们大多不一定知道什么是人类学,但每当得知我是中山大学毕业的,而且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和人类学博士,就肃然起敬,并为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甚至认为“我是整个民族的骄傲”。

多少年来我在这顶光环下成长、变老。实话实说,我长期为此忐忑不安,因为我个人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和能力,要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那就是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这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我进入了一个好的大学,这就是中山大学;我遇到了一个好的导师,这就是梁钊韬教授。

在过去的 28 年里,每当我在国内外获得什么荣誉,得到什么奖励,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在中山大学学习的日日夜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在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刻苦学习,使我从一个来自“世界屋脊”的懵懵懂懂、楞头楞脑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我永远不会忘记,1991 年 1 月,在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当江泽民总书记亲自把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颁发给我时,他接过我敬献的哈达对我说:“你是藏族,是学人类学的”。是的,我是藏族,而且是一个出生于农

奴家庭的藏族后代,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改革,我最多是一个会念经的小喇嘛,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更不可能有什么第一个藏族博士的荣誉和光环。

是的,我是学人类学的,如果没有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的中大老师们的教导,没有全心全意指引我进入人类学学术殿堂的慈父般导师梁钊韬教授,我也不可能有今天研究员、教授、博导等头衔和“研究藏族文化的开拓者”、“中国藏学领军人物”等评价,更不可能作为“为发展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表彰证书和政府特殊津贴,当然也不可能 2005 年 4 月 30 日上午再次进入庄严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并以学术身份荣获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和荣誉证书以及“五一”劳动奖章。正是在中山大学校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许多老师尤其是梁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下,我生平第一次开始系统学习人类学、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甚至还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这些从未接触过的新鲜知识。我的目光从此不再局限于一个高原,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我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宏观大局看待我们自己民族的源流,在国内外发表了《略论藏族古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渊源关系》等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和十多部学术论著,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藏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

我知道我是一个学者,我必须客观公正地论证研究课题,但我又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解放和培育了多年的老党员,我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奋斗,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矛盾的,但在我的身上必须是统一的。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在很多著述和演讲中不由自主地倾注了我的拳拳爱国之心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坚定意志。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比别人有更多机会应邀前往世界各国讲学、参会、交流。自 1983 年起我先后应邀出访美、英、法、比利时、日本、俄国、奥地利、德国、匈牙利、丹麦、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加拿大、菲律宾等 20 多个国家和台湾、香港等地区,除了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和讲课之外,1995 年 3 月,我很荣幸作为中国非官方组织(NGO)的专家代表,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发展首脑会议;2000 年 3 月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亚洲发展银行在菲律宾宾尼拉举办的“亚洲地区处理社会内聚与社会冲突”的高级学术研讨会。那么,我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机会出国学术交流呢?第一,我在中大学习了一个很好的专业——人类学,这是一个西方国家非常流行并重视的专业。第二,中山大学对我外语学习的高标准训练,为我的外语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对外交流活动打造了重要的语言工具。第三,我研究的对象在国际上关注度很高,这就是“西藏问题”。1988 年我第一次到美国访问,面对八十多人演讲,题目就是“农牧制还是香格里拉?——真实的西藏”,我用人类学田野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和不太流利的美式英语,完成了第一次艰难而又极为敏感的学术报告,热烈的掌声令我感到欣慰和自豪。通过参加这些对外学术交流活,既提高了我的学术水平,又明显拉近了我们国内藏学家与国外藏学家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海外藏胞与祖国的距离。

应该说在涉藏对外交流方面开创了新的交流模式和更加有效的宣传方式。充分发挥了我们非官方的超脱、自由、无拘束、灵活主动的民间学术交流特色,以学术交流和合作为切入点,寓政治和宣传于学术之中,充分发挥了我作为一个藏族科研人员在对外宣传西藏和反分裂斗争中的特殊优势,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我应有的一点贡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多次表扬。这一切都得益于在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学习和外语训练。

今天我很遗憾我的导师梁钊韬教授不能参加典礼,但他给我留下的题词我一直珍藏着,他专门为我题词,期望我:“为发展我国人类学而勇攀高峰”。我知道以我的能力和年龄今生我不一定能攀登高峰,但我依然的努力,依然在奋斗,近十多年来我在一些大专院校兼任博士生导师,为培养中国马克思藏学家和人类学家而辛勤耕耘,尤其是 2011 年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培养中国藏学 and 人类学接班人的教学工作中,不辜负梁钊韬导师的题词期望,为中国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发挥余热,我乐此不疲,至少我要对得起在中山大学荣获的两个“第一”的光环吧。

今天在座的许许多多同学与 28 年前的我一样,即将离开母校,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此时此刻,我作为中大毕业的老学长说几句发自内心的话:人生要有理想和信念,学问要有深厚的功底,做人要有道德和情操,工作要有干劲和精神,有了这几条,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受欢迎的人,是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大毕业生。



梁先生欢迎郑德坤先生讲学,右二为容庚,右三为郑德坤。(图片来源:南方日报)

怀念梁钊韬先生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梁钊韬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教育家。先生系广东顺德人,1916 年 6 月 26 日生,1987 年逝世。今年适逢先生诞辰 100 岁,特写此文以念。

梁先生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但回想先生之德、先生之学、先生之风,每每令人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三十多年前先生耳提面命,经常跟我们讲起复办人类学系的历程和艰辛。其筚路蓝缕给我们无尽的启示,不断激励着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和中国人人类学界勇往直前。文革以后,梁先生抱着“中国应建立自己的人类学”的雄心,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白手起家,从头开始。他亲自向学校和教育部写报告,充分论证社会主义的中国需要人类学:(1)文化大革命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科学正在复兴,人类学正是这一潮流中的一部分;(2)中山大学以前有过一个人类学系,所以大学仅仅是恢复这一学科的应有地位;(3)中山大学已经有考古学和民族学所需要的人力资力量。总之历史条件已成熟,无论是人还是政治条件都有利。他的真切灼见赢得了学校领导的认可,中山大学同意建立人类学

这一“新学科”,而当时中大只有考古学专业,设立民族学专业需要教育部同意。由于北京的学者及官员对整个计划赞成和反对都有,梁先生便亲自上北京为民族学和人类学论争。他与社会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等方面的关键学者,如费孝通、吴文藻、夏鼐、贾兰坡、吴汝康、杨成志、林耀华、王治秋等进行了接触,也与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国家民委、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进行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对。终于,梁先生见到了教育部的主管领导,一天傍晚在这位官员的公寓里进行了一次谈话。梁先生谈到了他的计划,他过去的工作以及中国为什么需要人类学。“在别的国家都有这一学科,我们为什么不能有?我们有这么辉煌的文化,这么多的人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人类学?我们中国人必须自己研究十亿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众多的资料——如果我们不研究,谁来研究呢?我们决不能把这一学科让给外国人!要让人类学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这样,北京批准了人类学作为中山大学的一个系,包含民族学、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1980 年农历除夕夜,梁先生收到了通知,这些年来为建立人类学系的努力终于实现了。在那一年年底,梁先生被国家学位委员会遴选为文化人类学的博士生导师,文化人类学成为中山大学第一个博士点,包括了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以及体质人类学等课程。

梁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为办好人类学系四处奔波,亲力亲为。他亲自调配系领导班子,物色教师;他亲自设

置专业,制订教学计划,安排课程,组织教材;1984 年,梁先生亲自主持召开了我国首次人类学国际性学术讨论会;1987 年,在梁先生努力下,教育部批准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今天,先生所创的基业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 2002 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学科评估稳居全国第一。目前拥有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四个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民族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这些发展都离不开梁先生为中国人人类学保留的根基。

梁先生在 1981 年复办人类学系后,一直主张包含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四个分支学科的人类学体系,这种体系既适合我国人类学客观条件,又符合当代跨学科研究的要求,他的这一学术思想在他主编的《文化人类学》这部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先生自己平生的治学,也正是一直实践着融合四个学科以研究人类体质和文化发展内涵的主旨。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正是抗战烽火纷飞的年代,中山大学也几迁校址,国难当头,梁先生没有忘记中山先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遗训,一边求学治学,结合人类学的最新理论方法和史籍资料,撰写了长达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一边投身救国和边政事业,饱含激情,写下了《检讨欧战德国失败原因证明日本必败》(1938 年)、《边政业务演习的理论和实施》。先生后来的治学涉猎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这早在求学阶段就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先生之风,永难忘怀。除了自身治学严谨外,先生对学生学术上的严格要求和生活上的关爱令弟子们受益终身。梁先生亲自培养了 16 名硕士和 4 名博士生,大部分弟子和学生

现在已经成为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如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鸿保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周大鸣教授等。格勒博士经常深情地忆起梁先生的教诲,仅 1985 年 10 月到 1986 年 4 月,他在成都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就先后收到梁先生十多封信,大部分是用毛笔写的,合计四十多页一万多字。格勒博士曾经噙着泪水读梁先生信中的肺腑之言:“我身体不好,容易疲倦,这是衰老的必然现象。但愿你们的事业、贡献远远超过我,这才是我真正得到的安慰!你说我对你像父亲一样关心你,师生关系应该永远如此。望父亲对学生的不倦爱心无悔投入,使学生们如沐春风,茁壮成长。”

先生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梁先生不仅认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最悠久、多民族的文明国家之一,拥有异常丰富的人类学研究资料,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人类学”,同时坚持人类学要为社会服务,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从边政研究到边政治理,从考古学研究与中国文明的探讨,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探索,先生始终坚持学以致用,倡导中国人人类学的应用性格。改革开放以后,出于爱国爱校热忱,梁先生牵线搭桥,努力争取香港工商界巨子赞助学校的建设,“梁鍊锯堂”、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基金会和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何氏教育基金会等,都凝聚了先生的积极奔走。这些与先生的学问文章一起,作为精神财富融入到人类学发展的滚滚潮流之中,付诸传人。



梁钊韬先生开创民族考古学研究

乔晓勤
廖平原

梁钊韬先生提倡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并开创了民族考古学研究方向,这一方向也成为中山大学考古学的研究特色。先生能够走上将考古学与民族学结合,研究中国南方文化之路与他的教育背景和学术道路关系莫大。1935 年先生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师从林惠祥教授和郑德坤教授,修读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课程。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之下,梁先生开始了他的既注重民族学资料又从事考古田野工作的学术生涯。1937 年先生回到了广州,继续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师从杨成志教授、罗香林教授和朱谦之教授。先生后来注重田野调查,长期研究中国南方民族史和对古代巫术的浓厚兴趣,都来源于上述三位学者的影响。

1937 年抗战爆发后,梁先生随杨成志教授取道桂林入滇,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在对滇江南面的抚仙湖口地区的苗族、瑶族的调查中搜集了不少关于当地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民俗、歌谣等资料。1941 年梁钊韬又追随杨成志教授到粤北瑶山瑶族中的“过山瑶”进行田野调查。虽然调查的时间不长,但所涉及的范围则包括了对瑶人历史、社会、经济、婚姻、家庭、信仰、传说、歌谣、人口、语言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所撰写的论文《粤北乳源瑶民的宗教信仰》(《民俗》1943 年,第 2 卷)作为整个调查组分工调查的一部分,分析了瑶族宗教的实质,指出瑶族宗教的主要特质“是精灵崇拜,有灵崇拜和妖物崇拜,而并非是道教”。1951 年梁钊韬参加了中央中南民族访问团第二分团到粤北瑶族地区及海南岛等地从事民族调查。1952 年他又作为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海南工作组的一员,再赴海南岛,对黎族、苗族聚居地区进行了深入的民族调查。1957 年他率领中山大学师生在海南岛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1958 年他在广东南海西樵山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 7 处石器地点,就这一考古发现撰写了《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8 年,第 1 期)、《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对其性质的一些看法》(《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 年,第 2 卷,第 1 期)等文章,成为对珠江三角洲地区最早的史前考古研究。同年,广东曲江马坝农民在狮子山石灰岩洞中挖出人骨化石,省文管会请梁钊韬鉴定。他依据其古人类学的知识和现场勘查,将其鉴定为古人头骨化石。后经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和吴新智等先生的进一步研究,将这一发现定性为早期智人的头骨,其年代为距今 13 万年前。马坝人的发现是华南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通过这些田野工作,梁先生提出,需要利用考古遗物的分布来研究古代民族的族别问题,指出在长江口两岸及江淮流域有古吴族的文化。浙、闽一代则先后出现了越、瓯越和闽越,广东中部有南越、西南部有骆越,海南岛黎族是古越族的遗民。他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对西瓯的族源、濮与莱的关系、濮与船棺葬的关系等展开研究。梁先生认为“濮”与“莱”是古越人的原始自称,其分布的地域比有段石锛和印纹陶的分布范围还要广泛。

1983 年梁钊韬和张寿祺在《社会科学战线》第 4 期上发表了题为《论民族考古学》一文,提出以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与历史文献互相引证、互相补充,对于一些历史性的事物作出更深入更细致的说明就是民族考古学的任务。这一研究新领域的开创和相关的理论、方法论的建设是梁钊韬在中国南方长期从事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和田野工作经验积累的结晶。继梁钊韬之后,容观琼、汪宁生、童恩正、李仰松等将中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成为当今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